

# 随 笔 体



关怀的诗学及其他

——谈诗小札拾录 / 西渡 解志熙

【摘要】“诗人之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每每遇到此事，还是会引起大家的关注。诗人、诗评家陈超的去世，引发了大家对“诗人之死”的再一次关注与思考。诗人西渡在陈超去世以后，也写了一首悼念陈超的诗作。这首诗既表达了对陈超的追怀悼念，也表达了他对当前诗歌创作中诗艺和精神的某种改变的不同看法。

西渡将写好的诗发给他的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师生二人往来邮件十封，在这些严肃的通信中，他们就“诗人之死”、诗人的“浪漫性”气质、诗艺、以及“关怀诗学”等诗歌创作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

## 关怀的诗学及其他

——谈诗小札拾录

西渡 解志熙

解老师：

近作悼陈超诗一首，敬呈解老师批评。久不动笔，诗艺荒疏，望老师不吝赐教。

陈超的去世，刚听到消息时我很震惊，但细思之下却也并非无迹可寻。从海子以来，诗人死于意外的多达十多二十起，令人痛心。我和陈超交往不算很密，但他为人谦和稳重，我在心中一直视如兄长，虽然对他的批评和诗，我都有所保留。

在诗中，我对这一切都无所隐而直陈之。近年

来时局多变，颇富戏剧性，有人欢喜有人忧，而我总觉得迷茫，不知道中国未来会向何处去，心中五味杂陈，诗中对此也有表现。当代诗只在语言和技巧上做文章，越写越玄虚，我对此久感不满。这当中也包括我自己的写作。所以，我这几年很少动笔。陈超去世以后，陆续看到不少悼亡之作，但诗人们似乎仍在自己的惯性之内写作，这样一个事件似乎并未引起诗艺和精神的某种改变，我觉得这样的写作必定是有问题的。这首诗算是我的一个自我突破的努力。

西渡 上 2014年11月29日上午10时

附：  
你走到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悼陈超

你走到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证明人与人之间的了解永远那么少；没有人知道你在受苦，你身边的亲人和学生对你多年的隐痛也无法感同身受。  
你我见面不多。有一次在大连，你拿着麦克学《红灯记》王连举的唱腔，引得满屋的笑声。我却感到寂寞，独自怀念戈麦，心想时代真是变了。另一次也是在会上，晚上在你的房间，你和唐晓渡谈到另一位诗人的诗作，你说：“爱才是诗的真正源头，恨是消极的感情，诗人不能被它左右。”这话深得我心，从此把你视为可敬的兄长。你邀请我带孩子家人到石家庄玩儿，趁孩子还没上学，如今他十八了，但我仍然没到过你的城市，而它和我们已经一起失去了你。

最近一次是在北大，吃饭的时候，你拿着厚厚的两大本会议论文集，指着里边的文章对我说：“这么多文章，只有你真正在和老先生讨论学术。”我也自矜地说：“除了学术，我不懂得谈论什么。”从那以后，有三年多，我没有见你。此外，只接到过你两次电话：一次是为了给你的新书写推荐语，你打电话来道歉，说是让我为难了，因为事先我并没有看到你的新书。还有一次，你问我有没有可能在我所在的出版社重出你的《探索诗鉴赏辞典》，这多少让我感到吃惊，但我却无法从命。说到你视为生命的诗歌批评，我必须坦率地说，它始终未能让我完全服膺，我私下认为，受制于某种宏大的话语和被人为荒废的童年，你和你的一代人未能培养起健全的感性，因而难以

真正深入诗的奥秘。也许，这只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有太多差异。有一次，你和朋友谈到自己的诗，“写得也不比谁差”，我感到惊讶，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你任何一首诗。

关于死，我也曾经认真考虑，在戈麦自沉后的一段时间。但我还有不舍，“父母在，不远游”；还有不甘，这世界不该就这样交给他们，我们活着，像一颗颗嵌入时代肉身的钉子。而我一直以为你是对死亡的诱惑，具有免疫力的人，那么多人需要你，敬重你；我也不愿意相信一个总把别人放在自己之前的人，会为了自个儿解脱轻易放弃。你走后，我梦见你在医院的走廊里醒过来，对哭泣的妻子说：“我也不想如此。”在梦中，我禁不住流下眼泪。多年来，我们已谙熟于与死亡周旋，学会了无所畏惧。我反对自杀，这信念近来越来越强烈。戈麦说，“生命太长”，他自沉的时候二十四岁；而一位活过了八十岁的老诗人说：“对于我们的灵魂来说，一生的时间太短！”还有那么多事没有做，还有那么多书没有读（那意味着多少灵魂的兄弟），还有那么多未尽的责任！还有，还有那么多的诗没有写出！既然，诗人从来就一无所有，我们只有和他们比我们的命，文明和野蛮，谁的命更硬，谁的气更长？你也许会笑着说，你这是在赌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的气数！

然而，说到底这些并不要紧。就算不能讲课，不能写文章，不能写诗，又算得了什么！文明和野蛮，世界的好和坏又算得了什么！虽然它的变故还时时牵动我的神经，但多年来生活的教训使我省悟，天并非扛在阿特柔斯一个人的肩膀上。歌德说，“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幸福尽他的职责，好的社会来自于好的个人。”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吗？不，也许只是为了

活下去。我们心爱的诗有权利活下去  
如同秘密传递的火焰 我们只是它的肉身。  
五点钟陪孩子一起打球才是重要的，  
在秋日的雾霾中陪妻子一起散步 才是重要的；  
在有风的日子 看银杏叶在眼前一阵阵坠落，  
才是重要的 这毒雾弥漫的人间 毕竟  
也还有几分美好。但我终于无法知道  
连续七天的失眠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那在高空诱惑你的 又是什么。  
“死是早晚的事 不必着急” 那时  
安慰我的朋友对我如此说 现在，  
我并不急着向你打听那边的世界究竟  
如何，“天堂没有雾霾 天堂没有忧郁症”，  
一个朋友在微信中这样说。  
但天堂也没有亲人和兄弟。我还要活着  
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 陪伴亲人  
和不多的几个朋友。尊敬的兄长 让我们就此  
握手 再见。再见 我的手留住了你的温暖，  
就像每一次诗酒聚会后的短暂分别。

2014.11.23

## 二

西渡：

诗人薄命 自古已然 近代尤甚。几年前我在  
纪念故诗人刘梦苇的一篇文章之末，曾经慨乎言  
之——

“文章憎命达”，而诗人尤其多薄命——单是  
1926年去世的新诗人就至少有杨世恩（字子惠）、  
刘梦苇、王以仁、白采（后两位也写小说）四位，除  
了白采年逾三十外，其他三位都是二十多岁的青  
年。记得前几年某报介绍美国加州大学“学习研究  
所”研究员考夫曼，说他研究了1987位已故美国、  
中国、土耳其和东欧作家，得出了“诗人最易英年  
早逝”的结论。但愿这只是过去的事实而非铁定的  
“规律”。

这并不一定因为诗人比一般人更不幸，而可  
能因为诗人比一般人的感受力更敏锐也更脆弱——  
正因为他们有过人的感受力，所以他们才能写出感  
人至深的诗篇，但也正因为有非常敏锐

的感受力，所以诗人的神经就较一般人更敏感、更  
脆弱，并且对自己和社会都倾向于苛求，如此既不  
能忍受也无法改变，于是在备感难耐之下，也容  
易走极端了。而自浪漫主义以来，诗人的独特感受  
力和过人的天才，得到了高度的赞扬，诗人更觉  
自己非同常人，所以也便不能忍耐常人所忍耐的  
一切，于是不是自杀便是癫狂。在中国现当代文坛  
上，诗人的此种“浪漫性”及其感受力一直备受推  
崇。其实“浪漫性”是难以持久的，敏锐的感受力也  
往往是双刃剑，其结果便是你所看到的“从海子以  
来，诗人死于意外的多达十多二十起”。这确是  
让人痛心的事，而诗人对“浪漫性”的信仰和对感  
受力的依赖，很可能是他们自戕的根源之一。西方自  
从现代主义以来，诗人渐趋正常，情况似乎好一  
点，在中国现当代诗坛上，却少见这种浪漫才性和  
感受力的转换——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观察，不  
知以为然否？你大概还记得，当你要来读博士时，  
我曾经要求你来一下，看你“是否正常”，而看看谈  
谈的结果是，我发现你是诗人中少见的“正常人”，  
所以才放心招收了你啊。

一个正常人也能当个好诗人么？我坚信可  
以。当然，所谓“正常人”并不是麻木不仁，而是要  
像常人一样承受欢乐、忍受痛苦、体会人生，并且  
努力去扩展自己的同情与经验，尝遍众生的苦恼，  
洞察万殊的真相，最终将体验到的一切澄净通达  
地表而出之，那才算尽了诗人之能事，而不要像浪  
漫主义那样，把诗人特殊化——可能因为我自己  
天生就是一个平庸的人吧，所以我比较反感诗人  
自恃的特殊化浪漫性，觉得特殊化的“浪漫性”实  
在害人不浅，误尽诗人。

你就是一个典型的正常的诗人。不强迫自己  
非要经常写诗，就是你的正常的表现之一。而一旦  
心有所感，也便化而为诗，让人有一种自然而然的  
感动。你的这首悼念陈超的诗，写出了人到中年的  
你对一个师友的真诚朴实的悼念、惋惜、同感和异  
议，慢慢道来，没有惊人之笔，而难得的是对陈超  
的痛苦和寂寞之体贴入微的体察，包含着朴实  
的人间情怀和应有的人生疑惑，语言形式上则近  
似于素体诗，给人自然而不刻意之感，所以我是很感  
动也很喜欢的。因此也相信你在一个自然的停顿  
之后，会有一个新的诗机之到来。

几年前，出版社的一位老编辑去世，据说是

慎从阳台滑脱,其实很可能是自杀,他生前把一篇长文给我,我后来给他发表了,可是发表后却不知把刊物和稿费交给谁——他身后似乎没有任何亲人可以联系了。当时心里很感慨,于是随手写了一篇我所谓的素体诗,顺手传上——

### 伤逝

老□呀,你倾注了心血的长文终于发表了,而我却不知把刊物和稿费寄给谁。是啊,你去世眼看近一年,可你的亲人却找不到一个:听说你的妻子或者说前妻十五年前去了美国,随后你的儿子也去了,你难见,我更是难觅他们的踪影啊;而你的父母早殁了,弟弟和妹妹也都没有任何讯息……我只能把书与款交给你的单位。是的,单位仍然在,大楼也依旧,还来了一些年轻人,就在你去了之后。

听到自己的文章几经辗转到我手,你不安地来函问:我半辈子都给别人当编辑,自己的这点心得可堪编发?半年后你就突然地去世了。怎么就那么寸啊,你竟然会从高楼阳台上失足滑落,还开着电视留下未洗的碗……安息吧,你忙了那么多年,头白了、腰弯了,还总是乐呵呵的,没有人知道你独居小屋的冷暖。天晓得你坠落时是惊慌、是无奈,还是解脱——如今这世界谁还在乎旁人的在或不在!

(纪念一位老编辑的逝世,2012年2月15日)

对人这种脆弱的生命来说,“死生事大,岂不

痛哉”,而我最反感的是一些人特别拿诗人之死大做文章,那种别有用意的夸大是对逝者的不尊重。也因此,确实很喜欢你这首没有刻意发“非常惊奇可怪之论”的悼念诗,觉得它写得朴素而近情、坦率而恳切、节制而深湛,于陈超是恰当的纪念。

随便谈谈,即祝顺利。

解志熙 11月29日下午

### 三

解老师:

我把悼念陈超的诗发给您,当然有求教于您的意思,但只想您读后略谈观感,然竟麻烦您写这么长的信开导并启示我,真令我感愧。因为诗中涉及对陈超的诗和批评的坦率批评,这诗目前阶段,也许并不适合拿出来发表。我只把更早的一个版本,发给少数几个朋友看过,只有张桃洲来信表示肯定。另外一位朋友则明确表示否定,以为过于平实,缺少意义张力,不能打动人。对这个批评,我不是很服气。因为我自觉在诗中是倾注了感情的,只是有意加以控制而已,而所谓“意义张力”也就在其中。这首诗的诗体,原来是想采用素体诗的,但是到底功力不够,一时还难驾驭这样的篇幅,最后还是写成了自由诗,但大体上还保持了某种形式感。

您对新诗中浪漫性的批评深合我心。“‘浪漫性’是难以持久的,敏锐的感受力也往往是双刃剑”,“诗人对‘浪漫性’的信仰和对感受力的依赖,很可能是他们自戕的根源之一”。这些话似乎一直回荡在我心头。“像常人一样承受欢乐、忍受痛苦、体会人生,并且努力去扩展自己的同情与经验,尝遍众生的苦恼,洞察万殊的真相,最终将体验到的一切澄净通达地表而出之”,是您对诗人的一种期待,也是我不断努力而还没有达到的境界。我从开始写诗,就要求自己做一个普通人,不以诗人对社会要求特别的权利和优待。但是,对于“浪漫性”,无论诗人怀有多高的警惕,它总还会不时跳出来跟你捣一下乱。所以,抑郁不欢的时候在我也总是有的。幸亏我身边还有几位可靠的朋友不时开解。自入清华之后,又常得您醍醐灌顶,为我解毒不少。这也是我要特别感谢您的。

×先生的事,以前未尝耳闻,但读您的诗,即

可深味其寂寞孤苦，想来也是一位总是把别人放在自己之前的人。精神的寂寞是比身体的痛苦更难忍受的。这种状况以后恐怕会有更多的人被迫领受。人之痛痒不能相关，乃不得不入于寂寞的深井。有三二知己常伴左右还是要紧的。陈超在石家庄 这点要求也难满足。这大概是其抑郁不断加重的原因。

西渡 上 2014年11月29日晚6时

#### 四

解老师：

此诗后又修改多次（也吸收了一位朋友在字句上的若干改动），这是最新的一稿。感觉还有不少地方待斟酌，但目前似已力所不及，只好留待他日。解老师闲时可一谈。

西渡 2014年12月7日上午11时

#### 五

西渡：

读了《悼陈超》的这一稿，我觉得诗的语言形式显然更趋于整饬而又不失自然，内蕴的情感则更为沉潜和深厚了些，所以我更喜欢了。而有感于你的求正之忱，此次我也顺手对你的诗做了一些改动，改动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把你的已经比较接近素体诗的“自由诗”，完全改成了整齐的素体诗，而口语之自然的语气节奏似乎并未丢失；二是我觉得你的这首诗还“残存”着某些比较浪漫的情调，比如“歌德说，/‘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幸福尽他的职责，/好的社会来自于好的个人。’/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吗？不，也许只是为了/活下去。我们心爱的诗有权活下去/如同秘密传递的火焰，我们只是它的肉身。/五点钟陪孩子一起打球才是重要的”一段，私意以为其中对诗的浪漫言说，似乎与全诗之回归朴素的整体格调不很相符，所以我做了改写——

歌德说，“人都要为自己的幸福  
尽责，好的社会来自于好的个人。”  
智慧啊，而智慧并不能解决烦恼，  
于是，我们只好凭了耐性活下去。

就连我们心爱的诗歌也未必不朽，  
只不过是寂寞的心火，通过肉身  
闪存。让我们承认五点钟陪孩子  
一起打球才是重要的……

我必须承认，这样改动是有点“强加于人”了，所以颇觉不安，好在咱们是相熟的朋友，幸勿见怪——在我只是一时兴起而已，你还是保持你自己的笔墨为是。

顺便说几句感想——

我知道你是久不动笔之后突然写这首诗的，而且改了一稿又一稿，然则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你，让你如此苦心和费心于此呢？我想，应该是对人生的苦乐、人情的冷暖之发自内心的关怀吧。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诗意的人，只是三十年来忝列文学研究者之列，也便不能不研究一点所谓诗，而以我的愚见，诗归根到底乃是我们人类作为“关怀的存在”，所以不能不有所关心或关怀的产物——禀赋灵性的人与动物之不同，就在于人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对自我的哀乐、生命的存殁、人性的美丑、人情的冷暖、社会的善恶有所关心或关怀，这种关心或关怀固然是从我们的自我出发，但不会仅仅局限于自我个体的范围，而必然会扩展到自身以外更广大的人类和世界、从日常的生存范畴上升到终极的超越境界。这关心或关怀之最深切的艺术结晶，就是诗吧；同时，发自内心的关怀如何获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表达，当然也是诗人的关心之所在，由此也便有了诗艺的变革和进步……我私下里把这种朴素的诗学意念自称为“关怀的诗学”。我们过去讲文学、讲诗，总是从这样那样的关系着眼或从各种各样的技术立说，但窃以为人类之所以在声色货利名之外还有所谓“诗心”，正是因为人类乃是在物欲利害之上还别有“关心”的存在或别有“关怀”的存在。没有这个，不会成为真正的大诗人——古往今来的一切大诗人，不都是因为他们的诗葆有深厚博大的关怀，才让我们肃然起敬、怦然心动、心有同感么？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或“民间立场写作”之争，及所谓“零度诗学”或“张力诗学”云云，都格局太小、斤斤计较、乏善可陈。即如有些人坚决必得有鲜明对峙的辞藻意象、构成强烈尖锐的张力才是好诗，穆旦早年的诗就是典型，充满了连篇累牍的张力表演，

仿佛西方现代派诗的生硬汉译，然而三十年来却广获盛赞，以至于被誉为现代汉诗第一。如此执着于“张力诗学”，其实患了消化不良的食洋不化症。

另，你29日的来信曾说：“×先生的事，以前未尝耳闻，但读您的诗，即可深味其寂寞孤苦，想来也是一位总是把别人放在自己之前的人。精神的寂寞是比身体的痛苦更难忍受的。这种状况以后恐怕会有更多的人被迫领受。人之痛痒不能相关，乃不得不入于寂寞的深井。有三二知己常伴左右还是要紧的。陈超在石家庄，这点要求也难满足。这大概是其抑郁不断加重的原因。”对此我也深有同感，上次匆复不及说，此处略作申述。诚然，关怀是人之为人的良知良能，但常被忽视的是，关怀者也同样需要被关怀，可人们却往往以为像陈超、袁先生那样一贯克制自己、关怀他人的人，一定是坚强自足、并不需要关怀的，所以也就常常在无意中冷落了他们，以至于他们只能孤独地独自支撑、不愿显露对关怀的渴望、生怕给别人添麻烦、加负担。然而一个人长期独自负荷，到某个时刻也可能支撑不下去，而痛感万念俱灰以至于突然撒手的。记得我二十多年前讨论到孤独个人面对黑暗与虚无之来袭的时候，曾经引用了里尔克的话“(生活)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乃正有感于独自支撑之艰难。是的，即使再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也需要关怀的支援。你为陈超的寂寞而心酸，问题或者正在于此——当他苦感寂寞之时，并没有人意识到他其实多么需要关怀的支援。上面说到里尔克，他正是有深切关怀的大诗人，其诗作如《沉重的时刻》曾深情地吟唱道：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  
无缘无故在夜间笑，  
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

以及《睡前诉说》：

我愿唱着歌催某人入眠，  
坐着并停留在某人身边。  
我愿将你轻摇对你轻声唱，  
伴着你睡眠出又睡眠入。  
我愿成为屋里唯一一个人，  
因为他知道：黑夜寒凉。  
我愿倾听入又倾听出  
听你听世界听森林。  
众钟鸣响着彼此呼唤，  
于是看见了时间的底。  
底下还在行走一个陌生的人，  
惊扰了一只陌生的狗，  
之后是寂静。我巨大地将  
目光放置在你身上；  
目光温柔地将你握住然后松开，  
一个事物正在黑暗中活动。

蕴含在这些诗作里的深广关怀，曾经让我感叹不已。我虽然无力做诗人，但对你作为诗人则很期待，所以略抒所怀，相信你在创作上一定会给我以及其他诗读者以更大的惊喜。

专此奉复，即祝笔健。

解志熙 2014年12月7日下午5时半

## 六

解老师：

收到您的改稿，大为惊叹！谢谢您！我发给您上一稿的时候，自以为已经无力甚至无可再改，经您动笔，才知道还有那么多可改可议之处。您的素体诗保持了语调的自然，而字句严格整齐划一，洵为大手笔。您的修改不止是对每行字数的调整，而且也使表达更为精确，还有一些修改显然已超越了原作的意识。譬如，“至于你一向视为生命的诗歌批评，我必须坦率说，它始终未能让我/完全服膺，因为受制于某种宏大/话语和激越情怀，你和你的一代/没有能培养起健全的感性，难以/

真正深入诗的奥秘”，这里增加的“激越情怀”四字，确实是对陈超以及和他年岁相仿的诗歌界同人的一个准确的心理素描，这是我之前未能意识到的。不过，素体诗与自由诗究竟是两体，所以风味上，我的自由体和您的素体（我觉得这个改稿已经是您的再创作）感觉还有所差别。我觉得两体都有其价值。将来有机会印集子时，如果解老师允许，我想两体同时收入，或可为以后的读者保存一点有意味的资料。最近我自己写的若干诗作，也保存了自由和素体两体。因为我感觉两体还不能完全互相替代。正如我上次给您的信上所说，我也考虑过把这首诗写成素体，但是因为我自己功力不足，对素体驾驭起来还有困难，另外也感觉素体难以完全传达我希望达到的口语风味和声音效果上的流动感。我对于素体，有时信心不足，也在这里。信心不足，一方面是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功夫下得不够。自由体在当代诗坛的绝对地位，也养成了诗人包括我自己在艺术上的懒惰。很多优秀的当代诗人，对素体持完全否定态度。我想只有成功的作品，才能够改变这种偏见。我愿在这上面做一点尝试，但在实际写作中，还是感到困难不少。所以您的这个素体稿就具有某种示范意义。根据您的素体稿，我又对我的自由体做了一些修改，用红字标出。另外，我觉得素体也不必每行字数完全整齐划一，尤其是这种篇幅较长的诗，有些行略有破格也该允许。所以，我对您的素体也略做了一点调整——主要是考虑语调的自然和接近口语，在稿中以红色斜体标出。两稿均见附件。

在我的自由体中，我未完全接受您所说有“浪漫情调”一节的修改。您的批评完全是对的。但诗确是我自己退守的最后堡垒。如果没有这一点对于诗的近乎信仰的盲目之热爱，我未必能坚持到今天。有时真是觉得这世界缺少光亮。诗多少在我的世界上撕开了一点黑暗。一些诗人加入基督教，还有的遁入佛教。但以我对理性的偏执，哪个宗教也难说服我皈依。如果没有诗，我或完全遁入虚无。诗帮助我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上，制造了或者说创造了某种意义或者意义的幻觉。这一点对我是重要的，尽管这意义并不能完全抵消虚无的进攻。另外从世俗意义上讲，诗帮我找到了一些性情相近的朋友。我一直觉得朋友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光明。

我非常赞同您所说的关怀的诗学。这首诗也

可以说是我的关怀的一点表现。陈超去世后，我曾梦见他，场景就如诗中所写。但我当时并未想要写诗。后来看到一些朋友的悼诗，还是修辞的表现为重，觉得有点不是味儿。再联想起海子以来众多诗人的非命，更加愤懑。这些感情和想法需要一个出口。这个出口，最后我在悼念陈超的这个题材里找到了。当然，有些东西是在写的过程中不断加入进去的。

我以前是不习惯把未定稿拿出来做靶子的。因为心理脆弱，害怕听到批评意见。现在我觉得自己强大一点了，好话坏话都可以接受。另外，我对诗的看法也有所改变。不再把诗看作一己的产品，因此，它可以而且应该接受他人的检验、修改。这无损于诗，虽然似乎有损于作者的面子——但实际上如果提高了诗的质量，它是给作者增光的。

我去清华之前，何吉贤鼓动我投您门下，特别强调您“懂诗”。入学之后，我发现您不但懂诗，而且我们的很多看法还很投合。后来看到您写的诗，又知道您不光懂，还能写。这次为我改稿，更证明这一点。我想，您为这个诗稿付出了如此心血，如果只为我一人独享就太可惜了——是否可以把咱俩的通信，连同我的自由体和您的素体一起转发给师弟师妹们，以让他们也能分享您的再创作呢？请解老师示下。

西渡 上 2014年12月8日零时30分

附：

你走到所有的意料之外……

——悼陈超

（自由诗三稿）

你走到所有的意料之外，也走到自己的反面，犹如一阵急骤的风，翻转一片秋天的树叶，或者起于星空深处的一声偶然轻叹，倾覆了行走在黑暗之上的航船。那是来自命运的律令吗？我们迟到的眼泪无法解释你的受苦，甚至身边的亲人也无法对你多年的隐痛感同身受。也许你太累了，也许你已经超越把我们留在本地的一切；而我们心中孤独的深井，在这个

秋天更深了。

你我见面不多。一次在大连  
你板着脸学起《红灯记》里王连举的唱腔，  
引得满屋的笑声。我却感到寂寞  
独自怀念戈麦，心想时代真是变了。  
另一个晚上，在你和唐晓渡的房间，  
我们一起谈到另一位诗人的诗作，  
你说“爱才是诗的真正起源，恨是  
消极的感情，诗人不能被它左右。”  
此言深得我心，从此把你视为可敬的  
兄长。你曾邀我和家人到石家庄玩儿  
趁孩子还没上学，如今孩子十八了，  
我还没到过你的城市，而它和我们  
已经一起失去了你……

最近一次是在北大，吃饭的时候  
你拿着厚厚的两本会议论文集  
指着里边的文章说：“这么多应景文章  
只有你真正在和老先生们讨论学术。”  
“除了学术，我不懂得谈论什么。”  
我的自矜会否让一向谦和的你感到  
一丝不快？此外只接到过你两次电话：  
一次是为了给你的新书写推荐语，  
你打电话来道歉，说让我为难了，  
因为事先我并没有看到你的新书。  
还有一次，你探问我有没有可能  
在我就职的出版社重出你的  
《探索诗鉴赏辞典》，这让我感到  
心酸，但我却无法满足你的愿望。  
说到你视为生命的诗歌批评，我必须  
坦率地说，它始终未能让我完全服膺，  
我私下认为，受制于某种宏大的话语  
和激越情怀，人为荒废的童年，你和  
你的一代人未能培养起健全的感性，  
因而难以真正深入诗的奥秘。当然，  
也许这只是无情的时间改变了我们对  
世界的感受。有一次，你和别人谈到  
自己的诗，“写得也不比谁差，”  
我感到惊讶，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  
你任何一首诗。  
关于死，我也曾经  
认真思量，在戈麦自沉后的一段时间。

但我还有不舍，还有不甘，这世界  
不该就这样交给他们，我们活着，  
就像一颗颗嵌入时代肉身的钉子。  
而我一直以为，你是对死亡的诱惑  
具有免疫力的人，我也不愿意相信  
一个总把别人放在自己之前的人  
会为了自个儿解脱就这样突然放弃。  
你走后，我梦见你，在医院的走廊上  
醒过来，对哭泣的妻子说：“我也不  
想如此。”在梦中，我禁不住流下  
眼泪。多年来，我们已谙熟于与死亡  
周旋，“这只是一场游戏，仿佛与另一  
自我的对弈。”我反对自杀，这信念  
越来越近乎固执。戈麦说，“生命太长”，  
他自沉时二十四岁，而一位活过了  
八十岁的老诗人说：“对于我们的  
灵魂来说，一生的时间总是太短！”  
我们还有那么多该读的书没有读，  
还有那么多未尽的责任，没有尽！  
还有，还有那么多的诗没有写出！  
既然，诗人本就一无所有，我们只有  
和他们比我们的命，文明和野蛮  
谁的命更硬，谁的气更长？你也许会  
笑着说，你这是在赌这片土地的气数！

然而，说到底这些并不要紧。就算不能讲课，  
不能写文章，不能写诗，又算得了什么！  
文明和野蛮，世界的好和坏又算得了什么！  
虽然人间的变故还时时牵动我的神经，  
但多年来生活的教训使我省悟，天并非  
扛在阿特柔斯一个人肩膀上。歌德说，  
“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幸福尽他的职责，  
好的社会来自于好的个人。”  
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吗？而智慧并不能  
揭开生命的谜团，于是，我们只好凭了  
耐性活下去。我们心爱的诗有权利活下去  
如同秘密传递的火焰，我们只是它的肉身。  
五点钟陪孩子一起打球才是重要的，  
在秋日的雾霾中陪妻子一起散步，才是  
重要的；  
在有风的日子，看银杏叶在眼前一阵阵坠落，  
尤其重要而且必须，这毒雾弥漫的人间，



毕竟也还有几分美好。但我终于无法想象  
连续七天的失眠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那在高处诱惑你的，又是什么。  
“死是早晚的事，不必着急”那时  
安慰我的朋友对我如此说：现在，  
我并不急于向你打听那边的世界究竟  
如何，“没有雾霾的天堂也没有忧郁症”，  
一个朋友在悼念的微信中这样说。  
但天堂没有兄弟。我还要活着  
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陪伴亲人  
和不多的几个朋友。尊敬的兄长，让我们就此  
握手，再见。再见，我的手留下了你的温暖，  
就像每一次诗酒聚会后的短暂分别。

2014.12.7

## 七

西渡：

早晨好。就像你在诗里所说的——

五点钟陪孩子一起打球才是重要的，  
在秋日的雾霾中陪妻子一起散步，才是重要的；  
在有风的日子，看银杏叶在眼前一阵阵坠落，  
尤其重要而且必须，这毒雾弥漫的人间，  
毕竟也还有几分美好。

遵照你的诗的启示，昨天晚上我在发出了对  
你的诗的改编之后，便陪着妻子在清冷的校园里  
散步，今天早晨六点半醒来，又叫起迷糊的女儿，  
看她吃早饭、送她出门上学——这就是诗的力量  
啊，一笑——然后习惯性地回到书桌前打开电脑，  
便看到你深夜给我的回信。

你说得一点不错，我对你的诗所做的并不是  
改正，而是改编。我的这个改编本和你自己的修  
改稿当然可以并存，你想在将来把它们一并编入  
集子，我没有理由不同意——其实诗不诗的，倒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冬季，我们围绕着生  
活、生命等问题的这些交流，确乎值得我们自己留  
存纪念。

就诗论诗，我觉得你昨晚的修改，虽不是很  
多，但有几处是改得更恰切了。比如——

还有一次，你探问我有没有可能  
在我就职的出版社重出你的  
《探索诗鉴赏辞典》，这让我感到  
心酸，但我却无法满足你的愿望。

记得“感到心酸”在你此前的稿子中作“感到  
吃惊”，我当时读过略觉不协，可是没有改动，你现  
在的修改就很恰切了。再如你原稿中的这两句“关  
于死，我也曾经 / 认真考虑，在戈麦自沉后的一段  
时间。”我觉得“认真考虑”有点知识分子气了，所  
以我顺手改为“关于死，我也有所 / 考虑，”但还是  
学究气，你现在改为“关于死，我也曾经 / 认真思  
量”，真是恰切，“思量”二字我尤其喜欢。

不妨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思量”是冯至很  
喜欢用的词，而我之所以对你这首诗深有同感，其  
中一个原因就是它让我想起了冯至那些朴素而深  
切的思量生命存在的诗章。1989年的下半年我赶  
写毕业论文，其中一章是关于冯至的，冯至先生读  
后欣然首肯，对人说“解志熙懂我”，并且给我写了  
颇长的信。可能是因为在那一章里我对冯至的生  
命态度和诗学态度之剖析，比较切合冯至的实际  
吧，同时我也应该承认，我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学术  
态度，也因此而深受冯至之影响，所以坦率地说，  
关于冯至那一章乃是我前十年所写的文字中至今  
唯一不让我感到脸红的。你可能没有看过那篇旧  
文，此处顺便传上，你看看，就知道我为什么激赏  
你的这首诗了。事实上，冯至就是所谓“关怀的  
诗学”的重要来源——冯至甚至为此而创造了一个  
汉语词汇“关情”。在冯至的视野里，人既是必须  
自我承担、独自负责的孤独存在，又是息息相关、  
相互“关情”的共在。正因为如此，冯至的诗既有对  
孤独个体之存在困局的深入揭示，又显示出相互  
关情、相互分担的庄重关怀。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生  
命态度。在读你的这首诗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了冯  
至的声音之回响。

说到写诗，我完全是个生手，你经验丰富得  
多，才是我的老师啊。你的几处修改很好，所以我  
在新的“改编”本里吸收了你的修改，同时也添加  
了几个字，庶几使这个改编本成为更完整的素体  
诗。我很赞成你的自由诗与素体诗并行不悖的意  
见，你想把你的自由诗与我改编的素体诗以及我  
们的通信，发给其他同学看，我也没有理由不同

意——这样坦诚交流,确实比较自然、比较亲切。

顺手传上我前不久为诗人徐玉诺一百二十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赶写的一篇短文。徐玉诺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很著名也很重要诗人,可是因为一直身在河南并且死得早,后来长期被冷落,至今几乎不为学界和诗坛所知,只在他家乡还有几个人记挂着他。学术界也很势利,多少好诗人和好诗被埋没了。我很少参加学术会议,但出于不平和同情,勉强写了这篇小文,上月去平顶山参加会议。你可以翻翻,其中两首民俗风情诗,实在写得极好,至今无人能及。

专此奉复——你事务繁多,此信不必回复。

解志熙 12月8日晨

附:

你走到所有的意料之外……

——悼陈超

(素体诗二稿)

你走到所有的意料之外,也走到自己的反面,犹如一阵急骤的风,翻转一片秋天的树叶,或者起于星空深处的一声轻叹,竟倾覆了行走在黑暗之上的航船——这是命运的律令吗?我们迟到的眼泪无法解释你的受苦,甚至身边的亲人也无法对你多年的隐痛感同身受。也许你是太累了,也许你已经超越把我们留在本地的一切;而我们心中孤独的深井,在这个秋天更深了。

你我不常见。一次

在大连你板着脸学《红灯记》里王连举的唱腔,引得满屋的笑声,我只感到寂寞,不禁想起了戈麦,心想时代真是变了;另一个晚上在你的房间里,你和唐晓渡谈到一位诗人的诗作,你说“爱才是诗的真正起源,恨是消极的,诗不能被它左右。”此言深得我心,从此我把你视为一位可敬的兄长。你曾经邀我和家人到石家庄玩儿,

趁孩子没上学,如今孩子十八了,我还没到过你的城市,它和我们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你,我的兄长。

最近一次是在北大吃会饭的时候,你拿着厚厚的两大本会议论文集对我说:“这么多的应景文章啊,只有你真正在和老先生们讨论学术。”“除了学术,我不懂得谈论什么。”我的自矜是否会让谦和的你感到一丝不快?此外接过你两次电话——一次是为了给你的新书写推荐语,你打电话来道歉,说让我为难了,因为事先我并没有看到你的新书。还有一次,你探问我有没有可能在我就职的这家出版社重出你的《探索诗鉴赏辞典》,这曾让我颇觉为难,我未能满足你的愿望。至于你自己视为生命的诗歌批评,我必须坦率说,它始终未能让我完全服膺,只为受制于某种宏大话语和激越情怀,你和你的一代没有能培养起健全的感性,碍难真正深入诗的奥秘。当然,也许这只是我们对世界的感受之差异。听你说“我的诗写得也不比谁差”,我感到惊讶,那时我还没读过你任何一首诗。

关于死,我也有所

思量,在戈麦自沉后的一段时间。但我还有不舍和不甘,这个世界不该就这样交给他们,我们活着,就像一颗颗嵌入时代肉身的钉子。而我一直以为你是对死亡之诱惑具有免疫力的人,我不愿意相信一个总把别人放在自己之前的人,会为了自个解脱就这样突然放弃。你走后,我梦见在医院的走廊上你醒过来了,很抱歉地对妻子说:“我也不想如此。”梦中的我不禁流下眼泪。我们已习惯于与死亡周旋,“这只是一场游戏,仿佛与

另一个自我对弈。”我反对自杀，这信念近来是更加固执。戈麦说：“生命太长”。他二十四岁自沉。而一位活过了八十岁的老诗人说：“相对于我们的灵魂，一生太短！”是啊，我们还有那么多该读的书没有读，还有那么多未尽的责任没有尽！还有，还有那么多的诗没写出！既然诗人本自一无所有，我们只有和他们比命，看谁的命更硬，看谁的气更长！哎，也许你会笑我是在赌这片土地的气数？

说到底这些并不要紧。就算不能讲课和写文章，甚至于不能写诗，又算得了什么！所谓人类的文明和野蛮，世界的好和坏又有什么！尽管人间的变故还牵动我的神经，但多年来生活的教训则使我省悟，天并非扛在阿特柔斯一人的肩上。歌德说，“人都要为自己的幸福尽责，好的社会来自于好的个人。”智慧啊，而智慧并不能解决烦恼，于是，我们只好凭了耐性活下去。就连我们心爱的诗歌也未必不朽，只不过是寂寞的心火，通过肉身闪存。让我们承认五点钟陪孩子一起打球才是重要的，在秋日的雾霾中陪妻子去散步才是重要的；在有风的日子，看银杏叶在眼前一阵阵坠落，尤其重要而且美妙——这毒雾弥漫的人间毕竟犹存美好。但我终于无法想象连续七天失眠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那在高处诱惑你的又是什么。“死早晚要来，不必着急”，那时来安慰我的朋友对我如此说，现在，我并不急于向你打听那一边的世界究竟如何，“没雾霾的天堂里也没有忧郁症”，一个朋友在悼念的微信中这样说。但天堂也没有兄弟。我还要活着在这个不完美的世上，陪伴亲人

和不多的几个朋友。尊敬的兄长，让我们暂时告别，为了将来再见。再见啊，我的手留下了你的温暖，就像每次诗酒聚会后的短暂分别。

2014.12.8

## 八

解老师：

收到您12月8日早上的信，感触很多，一直想做一个认真的回复。但是逢到年底，单位事情越来越多，家中琐事也颇不少，一时竟找不到一段清静的时间。如此拖来拖去，这封回信竟拖过了年，也是我自己想不到的。真是惭愧。

这两天认真拜读了您探讨冯至与存在主义关系的文章。您文中对存在主义的生命-存在哲学有非常精当的、深入浅出的阐述。尤为难得的是，您对冯至的创作和存在主义关系的说明极为透彻，所以冯先生才会欣然首肯您懂他吧。确实，把冯至和存在主义的关系撇在一边，就诗论诗，恐怕很难理解冯至成熟时期的诗歌创作，对《伍子胥》这样的小说也难有深入的理解（您文中所举的唐湜向《伍子胥》要求心理分析就是一例）。冯至也是我最为敬重的现代诗人之一。当代诗坛一直受惠于他的诗文和翻译，我也是如此。但读了您的文章，还是感到对冯至的理解加深了一层。文学批评做到如此，我想应该是尽到了责任，发挥了功效。照我的理解，冯至的创作成就所以高出于许多现代诗人之上，就在于它既建基于“我在”（自由、孤独而不可替代的个体）之上，又超越于“我在”而抵达于“共在”。现代诗人大抵处于这样两端，一种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他们的诗中到处写满了“我”字，对于“我”之外的世界则“冷冷的、淡淡的漠不关心”，而其诗艺的手段无非是自我抒情；另一种则以社会、大众为出发，为旨归，而抽空了情感和经验的主体，把诗情建立在一个“无我”的空中楼阁上。前者诗歌境界狭窄，手段单一，而且显出心智上的幼稚，似乎还保留了原始人或孩童式的思维特点；后者空洞无物，以观念代诗情，最后不免发展为虚伪做作，同样显示出心智上的欠缺，在现代诗史上为祸尤烈。冯至在两者之外找到了另一条道路，那就是以“我在”为基础，实现与他人、世界

的“共在”。冯至之尤为可贵或高人一筹的,正如您文章中着重指出的,在于他并不把这种“共在”视为一种伦理理想,而是视之为个人充实和扩大生命的一种方式,故其成熟时期的诗作能于“担当一个大宇宙”的同时,仍揭示着个体生命“孑然一身”的根本处境。我想这也是冯至从存在主义哲学收获的最有价值的成果。然而,这样的诗人终是少数。当代诗人中有类此观念的,大概就是骆一禾了。骆一禾的“博大生命”,其理想境界是“使孤独达到万般俱在”,与冯至的目标很接近。说起来,我与您的师生之缘也许远早于我投在您门下之前。我在本科期间读冯至的《伍子胥》——这小说在力量上我以为是可以和鲁迅《呐喊》一集相匹敌的——正是受了同学龙清涛或杜丽的怂恿,而他们或许正是受了您的影响。这样说,我于二十多年前就已经间接地受教于您了。

某一程度上,我也算得上是存在主义的信徒。我以为存在主义对于没有宗教信仰或者不能在宗教信仰中找到思想出路的知识分子,确是一种可以担负指导生活之责的有益的、富有启示的哲学;否则,无所依恃的个人难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以为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上可以无所不为,但又不能在这个无所不为中找到任何意义。我自己也是在这个矛盾中痛苦挣扎过来的。自由选择、自我承担、决断,这些存在主义的原则至少为存在主体提供了一种创造价值 and 意义的可能。我之得以脱离那个无意义的、虚无的黑暗深渊,多少是要感谢存在主义的。但我感觉存在主义哲学也还是有一些漏洞,所以还不能完全服膺于它。譬如,雅斯贝斯关于决断性质的论述,就不大能说服我。我以为,把决断视为超理性,是上了现代反理性潮流的当。我也不认为决断是瞬间的、每时每刻的事。决断固然不能全凭理性,除了理性,它还需要勇气,需要某种直觉力量的辅助,但是它之所以重要,根本上还在于它是一种理性的自由抉择——如果都依赖本能来选择,摒弃理性之力,我不以为这样的抉择有什么可贵,艰难和沉重也都谈不上了。这样的选择实际上倒可能是把人降低到动物水平。动物确是无计划地、每时每刻地做出选择的,但他们的选择并不自由。只有出于理性的选择,才有自由可言。决断之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人的自由选择,还在于人愿意承

担这一选择。承担,意味着人将以其全部的理性和意志,不计后果地坚持其选择,并付诸行动。这也就是说,重大的决断并非人每时每刻都面临的,而只有在某一重大的时刻,才会面对。这样的时刻就如伍子胥兄弟在城父迎来郢都使者的一刻。而决定一旦做出,此后应做的便是坚持和行动,而不是重新选择。我想,如若人每时每刻都须决断,这一时刻推翻那一刻,表面上似乎扩大了决断的应用,但那实在是否认了决断的重大意义。

里尔克意图通过生命在空间上的敞开超越生命在时间上的有限的方式,也有可疑的成分。在我看来,这种扩大和充实生命的方式其实还有其浪漫性的一面,所以有人称里氏为戴着现代主义面具的浪漫主义诗人,确实有其道理。对空间的渴望,倾向于把诗人塑造为一个漂泊的、移动的、处于旅途的人。这和诗人渴望未知、渴望新事物的心灵倾向可以说一拍即合。歌德不就自称为浪游者吗?在里尔克那里,诗人的命运也是由流浪艺人来表征的。这个形象在当代也被骆一禾、海子继承下来。但是,这种在空间中永不停留的“浪游”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方式吗?还是对真实的存在方式的逃避?显然,浪游是以不断放弃为代价的。放弃的也许就是存在的真实。我觉得对于充实和延展我们的生命,其实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以植物的、垂直扎根的方式,而不是以里氏为代表的,动物的、空间位移的方式来扩充生命的存在。植物是不移动的,但它的根深植于大地,所以它了解大地之上风雨晦明、春华秋实的四季轮替,也了解大地本身的构造和肌理,还有大地之下的矿源、水脉、地热。这种了解是远比不断移动的、无根的动物要深入的。植物型的诗人并不企图通过占有广大的空间来扩充自己的生命,他们只靠磨利自身的感觉,加大体验的强度,开掘经验的深度,以把有限转化为无限。他们的题材也许不如移动的诗人来得丰富,他们的诗境也许不如后者那样广阔,但他们的体验更深邃、更透彻,我以为,这也更接近日常的、真实的存在。陶渊明是这样的诗人,狄金森也是这样的诗人。狄金森据说足迹不出方圆数里之地,交往不过有限的几个亲友和邻里,但其诗境的丰富深刻,表现人性的广度和深度,以我的愚见,并不亚于那个典型的移动者惠特曼。冯至“多多经历,多多体验”的想法,与里尔克的“空间诗学”多少有些

瓜葛,其实也是里尔克作为一个诗人所奉行的。这个口号笼统说来也无问题,但是一旦实行,想来会遇到一些伦理的障碍,特别是当它被付诸人与人的交往时。诗人作为一个经历者、一个体验者固然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汲取养分,营养诗思,成功创作,但是作为一个被经历者、被体验者,这样的经历、体验也许并不令人愉快。和普希金一样,里尔克也有他的唐璜名单。为了诗人的艺术,有很多无名者做了牺牲。这些被诗人经历和体验的人,如里尔克自己在《一个妇女的命运》中写的,就像是国王在猎场上随便拿起来倾饮、随即放下的酒杯,被命运损坏了,“再也不珍贵,也永不稀奇”。显然,诗人对这些人的命运就缺少关怀,或者说诗人对诗的关怀超过了对人的关怀。这里的疑问是,诗的意义大于人吗?当然,诗歌不朽,而人在百年之内总要腐朽的。因此,批评家们要求我们原谅诗人,因为他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他的艺术向人们要求牺牲。但是,诗也许有伦理评判的豁免权,诗人恐怕并没有。何况,如果不为着人,诗之意义又何在呢?当然,实际人生要复杂得多,我们无法就普希金或里尔克的唐璜名单做简单的伦理评判。因为诗人既是经历者、体验者,也是被经历者、被体验者。但理论上的困局也不因实际人生的复杂而解除。事实上,这当中的龃龉已成为诗人和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在这个冲突中,诗人包括一些站在诗人一边的批评家总是批评社会,批评世俗对诗人的禁锢、扼杀。我过去也不自觉地持类似观点。存在主义的诗人还可以援引存在主义的信条——每个人都要独自承担自身的存在,任何人无法为另一人的存在担责——为自己辩护。但是,我觉得以存在主义的原则去要求他人是不公的,尤其是当对方并不是存在主义者的时候。萨特如此要求波伏娃是合理的(但未必公平),但涓生如此要求子君就不讲理了。我以为存在主义哲学只能应用于自我,而不能推及他人。一旦推及他人,任何不负责任的行为就都有了堂皇的理由。其实,世上的好多道理都是如此。多少不义之事都借好道理以行。另外,我也不大赞成里尔克不断乞援于贵人、赖人资助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上,艾略特做得比里尔克好,他宁愿为了生计在银行浪费他的时间和才华,而不肯接受他人的捐助。卡夫卡、史蒂文斯则是更好的榜样。我觉得“多多经历,多多

体验”这个口号多少还带有某种拜物教(量的崇拜)的味道。当然,冯至本身并不是一个空间主义的信奉者,他也没有向社会要求伦理的豁免权。这和许多东西方现代诗人是不一样的。从《鼠曲草》等诗来看,冯至的信念倒是有些契合于我所说的植物型的诗人,“不辜负高贵的洁白/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不就是一曲植物之存在的颂歌吗?但是,“多多经历,多多体验”这个口号的价值确实另需一番甄别。因此,我更赞成一种类植物的生活方式。当然,我不能说自己的生活已是如此,也不能说自己具备了从这样一种生活中提取、酝酿、创造诗意的能力——它需要更大的才能,更大的耐心,更积极的承担,因此它也更艰危——但确实心向往之。

存在主义是一个艰深的话题,我又素无研究,本来不该在这个话题上大放厥词。但终于忍不住抛砖者,不过想以此引解老师之玉耳。还请解老师赐教为盼。

徐玉诺也是我喜欢的诗人,虽然我以前读他的诗不多。读了您的文章,重新勾起了我对这位诗人的兴趣。前两天我从孔夫子网上买得了河大版的两巨册《徐玉诺诗文辑存》,准备以后有空时再认真研读。您推荐的那两首民俗诗确实很棒,口吻逼真,声情并茂。您说至今无人能及,看来确实如此。但我想不是今日的诗人能力不及此,而主要是因为当代诗人离民间越来越远,更甚者民间、民俗本身正在消失,自然,欣赏这类作品的读者也在消失。在这样情形下,诗人写这类诗的愿望就不容易产生,好作品更无从谈起。但您将之比作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我却有些不同意见。不知道为什么,对艾青这首名作,我一直喜欢不起来,虽然艾青至今仍是最喜欢的现代诗人——我以为他对于现代诗的“白话”之贡献超过了所有现代诗人。艾青是我的乡前辈,还是我的中学校友,我在中学时读艾青的书,都是他赠给学校图书馆的签名本。说到《大堰河》这首诗,我自己还闹过一个笑话。我先是耳闻这首诗,一直以为“大堰河”是条河,感觉这标题就有极大魅力,还向当地同学打听,“大堰河”在哪里。及至读到原诗,才知“大堰河”是个人,大倒胃口。我以为艾青这首诗其实未脱您所批评的左翼文人的“革命腔口”,对“大堰河”这个农民的女儿有故意的拔高,对自己的父母包括

作者自己则有故意的压低,因此我总觉着这诗有点做,有点装。这在作者也许是不自觉的,他当时可能正是信奉着某些理论,是按着这一理论的指导来写作的,而不是有意矫情。但这里就有某种自由个人的基点的失去,从而导致整个作品立足不稳。而这点做,这点装,也就隐含了艾青1940年代以后某些诗歌废品的基因。艾青1980年代对朦胧诗激昂的批评也令我失望。说起来,中国文人的晚年,令人起敬的少,令人失望的多。本来,随着年岁渐大,智慧长进,越到晚年,越应该呈现大师气象。但是,中国文人似乎越到晚年,功名心越重,私心越重,也越发小家子气,而且代代重复,真是令人感慨。我们这代人到晚年会有点长进吗?

这信已经写得太长,就此打住。

西渡 上 2015年1月5日

## 九

西渡:

我也和你一样,最近比较忙碌。一则学期快结束了,要结束课程、给你的师弟妹们做中期检查,还加上编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期的烦琐事务——这期稿子必须在本月上旬编出付排,庶几3月可按时出版,所以最近上课、看学生论文、审定《丛刊》稿件、开编委会……真是诸事纷扰、手忙脚乱,直到昨天才结束,于是今上午坐下来回你5日的信。

你这封信又一次让我感到人间缘分的奇特。在去年写的祝贺一位老师八十华诞的文章里,我曾经感慨地说——

是的,人间难得是缘分。犹记年轻时的我曾经困执于人生,乃遍读古今中外哲人的著作以求解惑,不料惑未得解而疑又丛生,不免感到一切合理化的解释其实都不过强作解人而已,唯觉大乘佛学的哲学基础因缘论差可慰心耳。因缘论略谓,世间万事万物皆无自性,一切都不过因缘和合而生而有。这筒古的说法足以解释一切有缘之有及其因果逻辑,即善故有善缘,恶必有恶缘。

师生的遇合就委实近乎偶然,我和我的老师是这样,你和我也是这样,但又似有某种缘分隐藏

其间。你来信说:“我在本科期间读冯至的《伍子胥》——这小说在力量上我以为是可以和鲁迅《呐喊》一集相匹敌的——正是受了同学龙清涛或杜丽的怂恿,而他们或许正是受了您的影响。这样说,我于二十多年前就已经间接地受教于您了。”这真让我惊讶莫名,因为我和龙清涛、杜丽二位曾经很熟,尤其是龙清涛,是一位非常单纯质朴的小伙子,我在博士毕业的时候,他好像刚读硕士,曾经热心帮助我排印和校对毕业论文,他当然熟悉我对冯至的讨论,包括对《伍子胥》的重新解读。并且,我还记得杜丽的妹妹杜玲玲(当时在北大读本科)曾经告诉我,她在北大的大教室里曾经看到有人拿着我的论文打印稿和存在主义的哲学著作对读。我当时听了只觉夸张好笑而已,现在看来似乎确有其事,而你的喜欢冯至,看来也的确间接地与我有关——没想到由此结缘以至今,真让人感叹人生的无理而有缘。

你的这封信可说是对我的“小扣”之“大鸣”。你对现代诗人趋于两极的概括和批评——“现代诗人大抵处于这样两端,一种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他们的诗中到处写满了‘我’字,对于‘我’之外的世界则‘冷冷的、淡淡的漠不关心’,而其诗艺的手段无非是自我抒情;另一种则以社会、大众为出发,为旨归,而抽空了情感和经验的主体,把诗情建立在一个‘无我’的空中楼阁上。前者诗歌境界狭窄,手段单一,而且显出心智上的幼稚,似乎还保留了原始人或孩童式的思维特点;后者空洞无物,以观念代诗情,最后不免发展为虚伪做作,同样显示出心智上的欠缺,在现代诗史上为祸尤烈。”——可谓切中要害,深获我心,而冯至的过人之处也确如你所说,“在两者之外找到了另一条道路,那就是以‘我在’为基础,‘实现与他人、世界的‘共在’。”这其实也是我比较喜欢雅思贝斯而不太喜欢海德格尔的原因。海德格尔对人这种存在的现象学分析,诚然深刻到黑暗的深层,如所谓在世的“畏”呀“烦”呀直至“死”的焦虑,然而他的分析始终囿于个体存在的黑暗面,晚年的他似乎想要给人一点光明,于是提出“诗意的栖居”说作为救济之道,其实仍然充满自我诗化、自作多情、一厢情愿的浪漫幻想,所以情有可原地成了一些自以为是的诗人聊以自慰的审美精神胜利法。雅思贝斯则不同,他既关注个体存在的本源性孤独,而又揭

示出孤独的存在者共在于世的相互关情以至爱的交流——冯至显然更受雅思贝斯的启发，他们是直接交往过的师生啊。顺便说一下，我觉得你对雅思贝斯关于决断性质的论述，似乎有误解——我已经睽违这些思想很多很多年了，但还是想勉强为雅思贝斯的决断观辩解一下。我想问题很可能出在我当年疏忽了一个解释：雅思贝斯并不反对真正的理性，他反对的所谓“理性”其实是指以利害得失为念的理智，在事关存在真伪的重大决断面前，理性并不多余，但充满利害得失之念的理智则适足以僨事。这可以中国的老子哲学来说明，老子的学说号称精深，可是所谓老子的智慧，全是教人在明瞭并无绝对真理之后如何理智地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所以老子的乍看似似乎明智之至的智慧学说，后来却为刻薄寡恩的法家和讲求权谋的兵家所用也。至于庄子的逍遥哲学，则让人在自由幻想的精神胜利法中省去了现世的人生难题，难怪诗人文人趋之若鹜。这两家都绝无孔孟那种不问利害的仁道坚守，所以我虽欣赏其文辞但对对其义理则只能敬谢不敏。

你进而把诗人分为植物性的深植者和动物性的漫游者两大类型，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发现，甚至可以说是洞见。而对你的偏好——“植物型的诗人并不企图通过占有广大的空间来扩充自己的生命，他们只靠磨利自身的感觉，加大体验的强度，开掘经验的深度，以把有限转化为无限。他们的题材也许不如移动的诗人来得丰富，他们的诗境也许不如后者那样广阔，但他们的体验更深邃、更透彻，我以为，这也更接近日常的、真实的存在。陶渊明是这样的诗人。狄金森也是这样的诗人。狄金森据说足迹不出方圆数里之地，交往不过有限的几个亲友和邻里，但其诗境的丰富深刻，表现人性的广度和深度，以我的愚见，并不亚于那个典型的移动者惠特曼。”——我也很能理解，我想补充的乃是，这两类诗人也不是截然对立、不可兼得。比如，杜甫就近乎集二者于一体，所以我们读他的漫游齐鲁和流离秦川的诗篇如《望岳》《奉先咏怀》《北征》，和读他寓居川中的诗篇如《春夜喜雨》《秋兴八首》等名篇，同样地欢喜赞叹，正唯其经验阅历之丰富和关怀沉思之深广兼而有之也。前几年我给张松建的书《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写的序里曾指出：“杜甫之于矛盾纷争的现代诗和现代诗

学，岂不正是最好的启示——在杜甫那里，为大众与为个人、国族的关怀担当与诗艺的精益求精、抒情、叙事和沉思，并非相互矛盾的存在，而是交相辉映的共在，此所以乃能为集大成于一身之‘诗圣’也。”其意亦可与此处相发明。当然，大部分诗人才性有偏、不易兼顾，于是各造其极而难免单调也。比如李白或者近乎漫游型的诗人，他一生游走不定，诚然颇有天才焕发之杰作，可是读多了总觉得有点蜻蜓点水而不及深入、活泼有余而难得沉潜也；王维或者可以说是植物型的诗人之典范，所作大都超然静观、悠然自得，称得上优美绝伦，可是读多了总觉得欠缺一点生命的活力和深度。这归根到底还是缘于诗人经验和关怀之深浅——借助于生活空间的拓展，固然可以扩大经验与关怀的广度，但空间之拓展若只拘泥于行迹迹象，也未必能臻深广。反之，陶渊明一生游历无多而常居田园，或者可称为植物型的诗人了，但其实他并不受田园之局限，其诗作的幽愤之深广，走马观花的漫游诗人岂可比拟呢。

说到这里，我或者应该为里尔克辩护几句。你“不大赞成里尔克不断乞援于贵人、赖人资助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上，艾略特做得比里尔克好，他宁愿为了生计在银行浪费他的时间和才华，而不肯接受他人的捐助。卡夫卡、史蒂文斯则是更好的榜样。”但我觉得这是可同情而不必挑剔的事情。受资助其实是欧洲文艺的一个传统：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欧洲的许多文学艺术家多是有才华而无恒业之人，他们的艺术创作因此需要“贵人”的资助和照顾才行，二十世纪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文学艺术家作为知识阶层的组成部分，渐渐获得独立，但同时也还有一些人继续延续着以前被资助的传统，并且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不可一刀切地要求他们——艾略特和瓦雷利幸而有收入不错的职位，所以可以独立不羁，可里尔克和卡夫卡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所以他们或者不得不寻求“贵人”的资助，或者不得不忍受沉落僚的折磨——我想里尔克心里肯定一百个不愿意被贵妇人眷顾和供养，而又不得不敷衍奉迎那些贵妇以致委屈自己，这实属无奈可悲之事而无须苛求也。至于你因为里尔克意图通过生命在空间上的敞开超越生命在时间上的有限从而判定他属于漫游或浪游诗人，这可能有误解。一则所

谓“里尔克意图通过生命在空间上的敞开超越生命在时间上的有限的方式”原是我从三十年代里尔克诗作的英译者 J.B.Leishman 的观点里引申出来的一个说法,其含义当然包括你所理解的通过漫游而获得实在的空间,但更重要的意思却不是实在论意义上的有形空间之大小,而是精神上的关心之扩大或怀抱之敞开——即个人对其他存在者(包括他人与外物、生者与死者)的发自内心的爱、关情和承担,纵使那些他人是陌生人甚或无名的死者,那些外物是大到浩瀚的星空小到无名的小草,都一视同仁。就此而言,里尔克恰是你所赞赏的植根于大地的植物型诗人,一个有着深广关怀和承担的诗人,他的诗学也正是我所谓关怀的诗学之始祖,如他在《布里格随笔》里所恳切申说的——

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是怎么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分离;——回想那还不清楚的童年岁月;……想到儿童的疾病,病状离奇地发作,想到寂静、沉闷的小屋内的白昼和海滨的早晨,想到海的一般,想到许多的海,想到旅途之夜,在这些夜里万籁齐鸣,群星飞舞,——可是这还不够,如果这一切都能想得到。我们必须回忆许多爱情的夜,一夜与一夜不同。要记住分娩者痛苦的呼喊,和轻轻睡着、翕止了的白衣产妇。但是我们还要陪伴过临死的人,坐在死者的身边,在窗子开着的小屋里有些突如其来的声息。我们有回忆,也还不够。如果回忆很多,我们还必须能够忘记,我们要有的忍耐力等着它们再来。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那才能得以实现,在一个很稀有的时刻有一行诗的第一个字在它们的中心形成,脱颖而出。

这是冯至 1936 年的译文,而更早并且更广为人知的是梁宗岱 1931 年 3 月致徐志摩的《论诗》函里的译文——顺便说一句,此前的梁宗岱并不了解里尔克,他是该年初在海德堡大学与正在研究里尔克的冯至交谈之后,才知道里尔克此论从而

率先发函报告于国内诗坛的,但从梁宗岱稍后华而不实的象征主义诗论来看,我很怀疑他是否领会了里尔克一片蔼然仁者之言的真意,只不过从“感觉敏锐、想象丰富”的角度为我所用地撷取了里尔克的皮毛而已。我觉得真正理解里尔克关怀诗学之要旨的是冯至,他所谓“多多经历,多多体验”人间苦乐这个说法,并不仅仅为了唯我的生命体验之增量,而更意味着共在的关怀和分担的重量。

你能喜欢徐玉诺的诗,我非常高兴。这是一个被长期忽视以至漠视的诗人,其实徐玉诺在二十年代前期相当著名、创作成就不菲,被公认为文学研究会的代表诗人,其声名几乎一时无两。但站在文学批评的立场来说,他二十年代前半期的写作也犯了初期新文学几乎难免的通病——凡所写作固然是真诚而发,却往往率性而为以至草率而作,所以他的诗在艺术性上就比徐志摩、闻一多和冯至差了。我赞赏的那两首民俗风情诗,乃是徐玉诺在二十年代末重返文坛后所作,此时的他已积累了创作经验,写作更为用心,故此真诚的感受乃能以恰当的艺术表而出之,成为真美悉称、自然浑成的杰作,令人叹赏不止。可惜的是,他后来生活困窘,创作未能继续。至于你对左翼文人的“革命腔口”之批评,我也深有同感、颇为厌烦。但坦率地说,你由此而批评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觉得难免迁怒过甚之嫌。其实,艾青走上诗坛,并不是你所猜想的“他当时可能正是信奉着某些理论,是按着这一理论的指导来写作的”。说起来,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艾青一心迷醉于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和现代主义诗歌,“九一八”后的一天,他还在巴黎或者里昂(记不清到底是哪个地方了)的街头学画后期印象派或野兽派(也记不准确了)的画,一个醉醺醺的法国人路过看到,对他大喊道:“中国人,你的国家都要亡了,你还在这里画这样的画!”这一声大吼深深地刺激了艾青,于是他启程回国到了上海。由于那时的国民党当局不抗日反而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所以激于反抗的愤青之义愤和基于朴素的爱国之情怀,青年艾青很自然倾向于左翼文化,致力于左翼的美术活动。这当然不能见容于当局,1932 年 7 月他被抓进了监狱。在不见天日的监狱中,艾青愤怒而绝望,到了冬末的一日他看到窗外飘落的雪花,不禁想起了早已去世的老保姆,于是写了这首诗。然则艾青此诗为什



么写他的农村保姆而他的深情是否就是基于左翼话语的矫情呢？这得具体分析——艾青固然是地主的儿子，但出生后就因所谓“克父”问题，被寄养于一个佃户家，那个佃户的妻子大堰河就是艾青的乳母。这是一个善良朴质的乳母，在幼小的艾青的心眼里，这乳母其实就是他的至亲至爱的母亲，所以诗人对他的感情是很真诚的，既未美化、也不矫情——想想看，连城里大户人家的孩子“迅哥儿”虽然一度讨厌他的保姆长妈妈，可是当长妈妈给他买来了谁都不愿给他买的“三哼经”后，他是如何的感激啊，以至于多年之后还饱含深情地纪念她。而大堰河则是一个朴实善良的乡村农妇，艾青是她屎一把尿一把拉扯大的呀，那感情之深厚更非“迅哥儿”可比，何况那首诗乃是艾青在命悬途穷之际所写，所谓人穷返本才呼爹叫娘啊。这样看来，《大堰河》既不矫情也不极左，而是发自自然性情并且自然“左”倾的艺术表现啊。我推测，你对《大堰河》的“大倒胃口”，很可能因为它不合你那时的艺术趣味，同时艾青当年对朦胧诗的批评也可能激起了你的反感，遂致迁怒挑剔也。我当然能理解你那时不愉快的观感，但窃以为“知人论诗”还是应该更细心、更体贴一点才是。蓝棣之先生是很优秀的现代派诗专家，但是他多年前和我说道现代诗，还是强调说，中国现代诗里若选一部诗集，自然是冯至的《十四行集》，如果要选一位诗人，那就必选艾青无疑了。我是同意他的这个看法的——私意以为，艾青三四十年代的诗作之所以可贵，并非因为“左”倾或不“左”倾，而在于它们既有真切的个人情怀又有超越个人的广大关怀，同时也相当成功地运用了自由诗体并显著提升了自由诗体的艺术水准，不知以为然否？

回到诗与人这种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来，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如果不为着人，诗之意义又何在呢？”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也正如你所指出的，存在主义哲学及与此相近的文学可以给我们宝贵的启示，却不能代替人们解决生活和创作中的难题，我多年前也曾强调，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大师们是坚决拒绝为人们提供所谓如何做人的规范伦理学的，现在也可以补充说，他们同样不会给人们提供一套可以遵循无误的美学的。然则如何接受和消化他们的启示呢？那也完全是接受者自己的事，他们并不能替接受者做好选择并为其选择

的后果负责。拿我自己来说，我得老实承认，在所谓存在主义先驱和大师们中，我比较喜欢雅思贝斯和近似于雅思贝斯的诗人里尔克，盖因他们的哲学与诗并不高自标置而较为恳切近人情、深切近仁道故也，却不很喜欢尼采和海德格尔，盖因二氏意欲极高明之境界故而取道于阴险峻拔之途，有时实在陷于不近人情的高调妄论和张皇幽眇的夸夸其谈，就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实行，往往一碰到生活实际的考验就不免抓瞎乱来，最后被迫回到人之常情和仁道之常理。海德格尔的一度妄行和忘形，你是知道的，此处我想起的是尼采的前矛盾。尼采一贯喜欢放言高论，力主重估一切，倡言超人精神、主人道德和强力意志哲学，视常人为庸人以至蔑视如寇仇，真所谓高视阔步、不可一世。可是据说1889年初的一天，尼采在都灵街头偶然看到一个马夫用鞭子狠狠抽打一匹马，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便上前阻止以至抱着马哭昏了。结果是回去不久就被发现患了严重的精神疾病，从此卧床不起直至死去。关于这个故事，我没有考证，不知真假，就当做一个传说吧，然则其寓意何在呢？有人说是因为尼采视马为高贵动物，见它受虐，所以悲愤难抑，而马即隐喻着尼采——这无疑是一个尼采式的高调解释，但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自以为超人的尼采不由自主地动了人的恻隐之心，抛开了所谓主人道德而为一匹马的不得善待而愤怒，此时的他倒是少有的人而近仁了。由此想起孔夫子的一则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孔子不像尼采那样关注马，那并非他贱视马，而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人显然比马的安危更应该关心。连带着想起的还有夫子的另一个著名故事——当他看到用木头人偶代替草做的刍灵为死人从葬时，他认为这是对人的不尊重——不仁，所以发出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的愤怒诅咒。的确，孔孟等先贤都非常关怀个人之仁勇和人间之仁道。我之所以称里尔克的关怀诗学是蔼然仁者之言，即有鉴于他暗合了仁美交融的中国古典人文主义诗学传统也。

没想到这封信断断续续写了将近一整天，颇为词费而仍然词不达意，真是徒唤奈何，而之所以费词如此，则因为你的思考与问题越来越深入，使我难以含糊其辞、敷衍塞责耳。只是你显然问道于

盲了。好在咱们是可以无话不谈的友人,所以我也就不揣简陋而信腕直寄了。

“疑义相与析”,我已经唠叨太多了,现在就静候你的意见吧。

解志熙 2015年1月10日夜2时50分

## 十

解老师:

我9日到深圳参加一个诗歌活动。这类活动我本来参加不多,难得此间主人对诗怀有教徒般的虔诚,又对我的眼力有一点盲目的信任,所以10月以来我两度赴深圳,算是为朋友帮点小忙。昨晚在旅社读到您的复信,本想马上回复,奈何我不熟悉旅社电脑的输入法,一分钟打不了几个字,只好又拖一天。

我在二三十岁之间,也曾像您一样,因“困执人生”而试图求解于中外哲人,同样“惑未得解而疑又丛生”。但我不曾像您那样下苦功遍读古今中外哲人的著作,加之理论思维力不强,读书囫圇吞枣,对哲人之心的理解自然谬以千里。对雅思贝斯“超理性”的妄议就是此类。幸得您及时指正。雅氏所非既是“充满利害得失之念的理智”,而非纯粹理性,则我完全赞成。众多当代诗人“执‘非理性’以为王牌”(骆一禾语),既造成诗艺上的偷懒,又酿成思想的旷工。我反感既甚,所以一见谁鼓吹“超理性”“非理性”便以为忽悠,不免唐突大贤,愧甚。至于雅氏于个体的本源孤独之外,“揭示出孤独的存在者共在于世的相互关情以至爱的交流”,我自然更无异议,并愿奉为个人处世之准则。您对老子的批评也道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对老子一向不大有好感,他的哲学全以得失为出发,所以不免为诡诈权谋者所用,贻误后世不浅。但对庄子的看法,我与您稍有不同。先秦诸子,我独爱庄子。庄子之书,我以为乃诗人之书,似不当于字面读之,也不当全以概念分析为法。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庄子乃是有大痛横梗于胸中之人,他的话在我看来很多都是痛心至极的反话。如果我们都从正面去听,不但误解庄子,也足以误解人生。事实上,老庄并列就是一大误会。至于后世庄子徒孙,不但不解庄子真意且多矫伪,以逍遥为号而好名,以齐物立论而贪利,您名之为“精神胜利法”,可谓名实

相称。——道家作伪的风气在历史上似乎并不亚于儒家。

海德格尔在当代诗坛一度大受推崇,有些诗人、批评家言必称海氏。这一风气近年来才稍有转移。诚如您所说,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分析“始终囿于个体存在的黑暗面”,但也正是其存在学说的个体立足点,赢得了天然倾向于个人的诗人之心。畏、烦、死这类情绪1980年代以来成了诗坛的流感,带来不少消极影响。不过这类情绪在人心自自有其基础,其传播才会如此迅速、广泛。时代和人心本身病了,病态的思想才会找到寄居的载体。海氏“诗意的栖居”之说,确有自我诗化、自作多情、一厢情愿的一面,但在我们的环境中它也提供了某种救济之道,帮助一些人抵御过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风暴,尽管这一救济之道现在看来是无根的,并不坚实。故而,我还不能断然否弃海氏之说。另外,海德格尔谈诗也不全以个体为出发,在阐发荷尔德林之时,海氏提出诗人的使命乃在“为民族谋求真理”,也可能正是这一点使他看不清纳粹国家主义的危害而自污其身。但在我们今日一般民众和诗人都陷于其中的原子化生存状态中,诗人和诗抛开个人利益之计较,“为民族谋求真理”恐怕仍有其紧迫性。而我以为,今日为中华民族谋求出路,谋求真理,也正是为世界谋求出路,谋求真理。中国今日之状态若无出路,则世界亦无出路耳。您批评海氏和尼采多有“不近人情的高调妄论和张皇幽眇的夸夸其谈”,所言极是。这类毛病是高视自己的天才人物常常易犯的。不过,不仅是诗人,近人做学问似乎也多有此病。要疗救此病,您所说的“恳切近人情、深切近仁道”正是良方。孔子可能是一个好榜样。只可惜孔子学说传播流变,后世所谓孔学者,去孔子已远。此中我也多有疑惑,以后再专门请教。

我对于植物型诗人和漫游型诗人的区分只是基于一个粗浅的观察,更深一层,则是基于对某些当代诗人以占有材料为能事的倾向的一种不满。承蒙老师指出,两类诗人并不截然对立,在大诗人那里,“经验阅历之丰富和关怀沉思之深广”正是兼而有之。这是把我的想法又推进了一层。至于我对里尔克的批评,正好把我暗于“知人论世”的毛病暴露无遗。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其特定的环境,有其众多的不得已之处。对诗人生存的环境不

做认真考察,对其内心生活缺乏领悟,批评便不免失去分寸。您的指正对我是一个十分及时的提醒。里尔克原是对我影响最大也是我衷心热爱的诗人。他的诗集是我出门时最常携带的。我很难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中读其他人的诗,但里尔克总能让我安静下来。把他视为单纯的漫游型诗人是我的另一失察。因为里尔克诗中流浪艺人的形象在我的脑中印象太深,加之里尔克一生多漫游漂泊经历,长时居无定所,匆忙中便拿他做了漫游型诗人的代表,竟没有想到诗中的形象不过是表现和象征,不能如此简单地与诗人自己的主体形象等同起来。这实际上已违背了诗歌批评的原则。里尔克虽然倾心漫游,但他也是一个有伟大承担的诗人,而且对事物、对人的存在有最深沉的体验和最体贴的关怀,也正是一个兼有植物型和漫游型诗人特点的大家。您信中提到梁宗岱,也引出我的一点想法。梁氏在当代诗人中声名颇著,因他晚年提携过一两位年轻诗人,留下了一段佳话。过去我认为,在现代诗诸名家中,梁氏最“先进”,见解最高,也最懂诗。但也有疑惑,因他好辞藻,又决然否定自由诗,与他提倡的象征主义似不能完全吻合。经您提醒,我想大致可以确认梁氏的趣味仍停留于浪漫主义,或与徐志摩、闻一多相伯仲。这种倾向也使他与实际人生颇有隔膜,故而难以承担人之存在的真实分量。

我对艾青《大堰河》的批评,如您指出的,极有可能受到我自己的诗歌趣味的蒙蔽。我一直以为此诗哭天抹泪,情感显扬太甚。另外,这首诗散文

化的程度在提倡散文化的艾青也是极端的。但对艾青整个创作的评价,我完全赞同您和蓝老师的评价,以为可以代表新诗前三十年的最高成就。其情感之深沉,关心之广大深切,运用自由诗体之纯熟,至今也还没有人超越。尤其在关心之广大深切这一点上,当代诗人与艾青相比,确乎显出很大差距。骆一禾有“博大生命”的理想,思想清明深邃,奈何天妒英年,不及“修远”其道路便遽尔离世。当代很多诗人考虑的不过是个人声名,实际利益,其世界视野仅限于个人名头在国际诗界的传播。这个取向正与您所揭橥的关怀诗学相反,诚所谓盖楼于沙滩,植树于岩隙,地基不牢,根本不深,欲以此求诗之长进,自可预知其无望。

前日上午于深圳荔枝公园,惊见大树梅花开放。真没想到,正当北地苦寒之时,春已先到岭南了。昨晚宿于滨海之洞背村。晨间下过小雨,放晴后与三二诗友上山闲步。此时天朗气清,于半山远眺海上波光,心情大佳,似可忘北地雾霾之黯黯,累日琐事之屑屑,乃至宿酒之痛胃。一个多月来与解师谈诗,谈命运,谈生活,我的收获也像这样。

已近子夜,就此收笔,老师晚安。

西渡 上 2015年1月12日23时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计划出版社;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张涛)